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宋以敏¹

非常感谢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再一次来到这里，和各位学者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世界影响问题交换意见。记得2007年初，我在这里的学术讨论会上，曾就国际问题研究和中国外交的关系作过一次发言，其中谈到中国学术界关于时代问题的争论。今天就想围绕本届会议的主题，再着重谈一下中国和平发展路线的确立和对时代判断的关系。也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会分成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三十年？头三十年经济没有发展，对世界所作贡献甚微；后三十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我以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对时代的判断不同和据此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因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下面就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三十年及其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分三部分谈一些纯属个人的看法，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批评指正。

I 前三十年我们对时代作了错误的判断

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化传承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大国，曾对人类作出过不少杰出贡献，还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实体的地位。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和其他重要社会指标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进入近代，更迅速衰落，终于沦为“东亚病夫”，受尽列强的侵略和欺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摘掉了“东亚病

夫”的帽子，并且建立起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摆脱了农业国的地位，还自主研发出能够说明已具备成为大国条件的“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地球卫星）。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却并未根本改变长期停滞的趋势，这使我们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² 其实，在1958年前的八年，推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些政治运动，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头几年经济增长较快，是由于带有恢复性质和土地改革对农民的解放，以及在苏联援助下开始一大批工业项目的建设。但是三大改造，特别是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却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力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从总体上看，建国后头三十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

共产党的宗旨不是要解放人民，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吗？为什么会事与愿违呢？简单说来，就是由于我们对时代判断错了。以错误判断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方针和选择走的道路，自然不会对头，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时代的判断对党和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什么是时代呢？我们这里所说的时代，就是指整个国际形势在一个相当时期发展的总趋势，主要涉及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对时代特征，也叫时代主题或世界主题。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历来都把时代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因为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2 (1) 2010
还是知识的更新积累，二十世纪下半期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时代。

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正确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各共产党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制定战略方针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其他重要政党和国家，在制定纲领和政策时，首先考虑的也必然是总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只是可能不用时代和时代特征这些名词就是了。我们国家头三十年丧失一次特别好的发展机遇，吃了大亏的原因正是由于，明明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我们却坚持认为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

世界局势发展表明，二十世纪可分为大体上各为一半的两个时代。前半世纪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后半世纪为和平与发展时代。这里讲的战争是指世界大战，不算局部战争和一些国家的内战。因为只有世界大战才能影响到整个世界（特别是所有大国）和人类历史的进程。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³ 这里讲的革命，也是指世界大战引起的世界性革命运动，而不是指个别国家的革命。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情况正好就是这样：两次世界大战（加上战前备战和战后恢复），大战引起两次世界性革命浪潮。战争与革命及其对全球的影响，确实贯穿了整个上半个世纪。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国际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战争与革命时代由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人们看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不但世界大战早已停止，而且战争的创伤也得到基本平复，各国的主要任务都已放到本国的社会发展上面。与此同时，二战引起席卷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许多国家也先后取得胜利，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崩溃。在发达国家中，战败的法西斯国家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造，其他国家也都进行了一定的民主改革，建立和改进了社会福利制度。总而言之，二十世纪下半期，虽然还有美苏之间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和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以及各种恐怖活动，但是就总体来说，世界还是赢得了持久和平，人类过上了长期的和平生活。而且正是在和平的条件下，世界上掀起了两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把人们的生活提高到一个全新阶段。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进步，

问题就是这么明显：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世界就已走出战争与革命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是中国却仍然认为时代没有变化，并且坚持了三十年。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认为有外来与内在两方面的原因。从外来因素讲，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世界革命。而且根据列宁主义，二十世纪初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所以也就把“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不但中国共产党，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坚持对时代的这种判断。这也是它们后来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国际因素外，中国还有自己本身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个实行高度集中制的党。党章规定全党服从中央，在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后就是全党服从毛泽东。而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所有领导成员又都是从长期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观察思考问题和行为处事方式总会受到战争年代经历的影响。毛泽东本人就只讲不断革命，而不知发展经济。邓小平在1985年改变对时代的看法后，也批评毛泽东说，“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⁴

前面说过，对于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是制定战略方针的基础和前提。正是由于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错误判断，所以据此制定的方针路线自然会犯错误。这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并执行闭关锁国政策。而且随着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估计愈来愈“左”，制定和执行的政策也越来越偏激。例如由于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一开始经济建设就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地区发展布局上不去发挥沿海和大城市的优势，而把重点放在条件并不方便的内地。后来更发展为搞“山，散，洞”的“三线”（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为三线）建设，就是把新建的工业项目以及从沿海搬迁出来的一些重要企业，分散到西

部山区的洞穴里。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对战争的威胁估计得更加严重，甚至认为迫在眉睫，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中国准备打仗的言行，曾经一再震惊世界。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曾声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⁵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随着自己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激化，中国的对外战备也更为加紧了。毛泽东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全国响起了“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口号，使国家长时间处于临战状态，到处挖战壕，防空洞，地下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顾上经济建设？最后更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

这还只是谈的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对策，至于国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影响就更大更深远了。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严格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再加上对外闭关自守，就把国家经济给弄得很死了。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人民遭受到巨大苦难和牺牲，也摧残了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无可挽回地伤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元气，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II 在时代判断上的拨乱反正及其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多年的世界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不管人们在理论上是否承认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时代，只要实际上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一定快，否则就必然落后。1980年代以前的日本和中国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东京等城市几成废墟，人民缺衣少穿，饥寒交迫，一直过着苦日子。后来由于进行

了民主改造，执行了坚持和平发展的吉田茂路线，从实现全面恢复的1955年到1970年，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创造出“奇迹”，成了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处在和日本同一条起跑线上的，经济总量还大大超过日本。但由于对时代判断错误，竟与世界潮流反其道而行。人家着眼于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我们却重视对内搞“阶级斗争”，对外花大力气支援世界革命，还因此引起了不少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不满。二战后一个特别重要的世界潮流是国际化的快速发展；我们却实行闭关自守，防止“和平演变”和反对“西化”。总之，人家在迅速发展，我们却落后倒退，很快就拉大了差距。例如据世界银行资料，1955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4.7%，1980年下降到2.5%。而日本却从1955年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的2.4%（约为中国的一半）上升到1980年的9.5%（已为中国的四倍）。另据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提供的数据，1948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在世界各国的第四十位；到了1978年，反而排到了倒数第二，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二，而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看，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都排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170位以外。⁶

在十年浩劫后，中国人从上到下都认识到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瞎折腾了，必须拨乱反正，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党和政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针新路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实行这一转变是比较容易的，但开始时却没有解决对时代特征的判断问题，因此也就不能放下心来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因为在决定改变发展路线前后，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有好些年还坚持认为，战争只能推迟，不可避免。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战争究竟能推迟几年，要不要为打仗作积极准备，现在搞的建设一旦打起仗来不就又破坏了，等等。总之，不改变帝国主义必然产生战争的过时观念和对时代的陈旧判断，就不可能彻底走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好些年的拨乱反正大讨论中，也包括对时代特征的重新认识。例如战争是不是可以避免，支

援世界革命（实为输出革命）是否对头，以及对美国，苏联和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仅学术界，而且领导层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与此同时，中国的党和政府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大量派人出国访问，了解国外情况和学习外国经验。经过讨论和观察，意见渐趋一致。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改变了对时代的认识和判断。

从1984年起，邓小平就多次向外宾谈到，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改变。比较完整的说法是两次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一次是1984年11月1日，他说战争危险我们讲了好多年了，现在应该作出新的判断，这样才能够安心地搞建设。否则，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搞建设，更不能搞全面改革。⁷另一次是1985年5月4日的讲话，正式宣布了中国对战争看法的转变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的转变。⁸在同年3月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⁹随后中共中央又明确界定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不但将其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定为国家长远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学界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界，长期热烈讨论世界是否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起因。所幸最后在大多数人中达成了共识，持不同看法的已经很少了。

1980年代解决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特征的判断问题，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建设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标尺。从此，中国在经济上摆脱了两千年来长期停滞的局面，走上了空前的快速发展道路，并放手解决了与此有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市场化。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几百年的世界历史证明，任何国家要得到经济的发展，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市场化和技术革新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之所以落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实行对内对外的市场化。正好，从1970年代后，世界兴起市场化潮流，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参与市场化的人口数量一下子由六亿上升为六十亿。中国虽然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但还是赶上和进入了市场化潮流。另

一个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在这之前，由于国际交往中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所以被称为国际化）。全球化固然是全面的，包括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但首先还是经济全球化。中国在解决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后，就更加大胆地实行对外开放，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实行市场化和参与全球化以后，中国经济更是如虎添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例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其速度之快，大概就破了世界纪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得上。不少大中城市，真像当年邓小平对上海所要求的那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美。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但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甚为突出。三十年的发展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三百年，甚至三千年。现在十多天的产出就相当于1978年全年。中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一个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也已接近日本。当然，按人均产值和技术水平等重要指标看，中国跟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即使好好干，发展顺利，恐怕三五十年也不一定能赶上它们。

不仅如此，还应清醒地看到，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神速，但也存在着不少比较严重的问题，绝对不能忽视。由于我们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认识和把握还不够全面，拨乱反正做得很不彻底，因此就没能完全跟上世界潮流。前面说过，二战后有两大世界潮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我国的民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化也不够成熟。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知道，我国经济发展快，首先是由于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是在低人权，低人力成本和高投入，高资源消耗的条件下取得的，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的发展。其次，是由于二战后有技术革命中的大量成熟技术，可以被我们引进；有现成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步地让我们参与。更由于我们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和碰上并利用了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机会，发展了他们开始转移但仍属必须的产业如家电，服装以至钢铁等。这就使我们经过一段

时间后已越来越紧迫地遇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大问题。认识很早，但却转得很慢。按人均计算，中国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长期主要靠外贸和投资拉动，实行粗放经营，不但在寅吃卯粮，而且也难以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大问题。

带来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些，还要更多。例如我们十多二十年贫富差距的拉大就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几百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比日本高得多。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都很显著。到一些大城市看，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是到内地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看，却相当贫苦和落后。我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社会还不是个成熟的社会，距离公民社会还有很大距离。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滋长了不少社会矛盾。

以上情况说明，经过三十多年前对时代判断的拨乱反正，中国很快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中国人民也感到自豪。但不容忽视的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偏见和误解。在国内，部分人中产生了一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的倾向，助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外，一些人产生了对中国的疑虑，嫉妒甚至畏惧，鼓吹“中国威胁论”，把中国的和平发展说得很是可怕。还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中国说成已经是或即将成为“超级大国”，甚至提出美中联合领导世界的所谓“G-2”。上文提到我们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要说明，无论是头脑发热的中国人还是怀有疑虑的外国人，都是只看到中国的经济成就，甚至有很大夸张，而忽视了中国面临的困难。中国不但没有资格和美国相提并论，而且邓小平老早就宣布：“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III 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的第一人口大国。但是我们感到惭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不但对世界贡献甚微，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还在某些问题上成了世界的拖累和给一些国家添了麻烦。例如由于“大跃

进”和反“右倾”，人为地制造了1959-1962年的三年困难，就曾牵动美苏等国。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它们都曾提出要提供援助。我们当时也确实花钱进口了大批粮食。至于添麻烦，这里主要指那个时候的支援世界革命。为了尽国际主义义务，搞世界革命，我们确曾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革命团体提供过人力，物力，财力的援助，做了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至于接受中国影响的还不在于其内。例如一些发达国家中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产生的极左思潮，好像至今还没有绝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毛派游击队之类，也还在继续活动。当然这决不是说，新中国头三十年对世界只有负面影响，没有正面贡献。其实，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存在本身，就是促使殖民主义体系崩溃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更不用说实际活动了。所以，否认新中国头三十年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后三十年，正像前面讲过的，由于端正了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改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中国经济就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国力的日益加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就越来越大。这里只大略列举以下几项。

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试想，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处于动乱和贫困的状态中，那将是对世界多么大的威胁。单是一个难民潮就会使世界不胜负担；如果再继续支援世界革命，那又会使许多国家不得安宁。而中国的发展本身，起码也意味着五分之一人类的进步。这个道理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过去，一个大国的兴起，大多要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这次中国的兴起却并没有走这条路，而且在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也不容许任何新兴国家走这条路。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成长，加速了世界战略格局的多极化，抑制了霸权主义，成为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保证。

第三，中国的积极参与，是世界市场化

和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巨大推动力量。中国的兴起和世界统一市场的最后形成几乎同步，这决不是偶然的。而市场化就是全球化的基础和前提。市场化和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世界面貌和人类历史，这是人们都已看到的。

第四，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大批廉价商品，特别是广大中下层群众日用的必需品。这就是为什么近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只涉及轮胎，钢管等产品，而不敢触及服装等日用品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庞大市场。建国后头三十年，中国的外交主要谈政治，后三十年已经越来越以经济为重点了。许多国家要和中国搞好关系，主要的就是看好中国这个市场。

第五，经过三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国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国曾经起过救火队的作用。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起的这次金融危机，人们又把眼光转向了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GDP虽然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和欧盟的四分之一，但从2007年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居世界第一位。

第六，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进和规章制度的修订，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秩序的不断合理化，也捍卫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前，解决世界经济有关问题，好像只是由几个大国说了算。开个G-7首脑会议甚至财长会议，由它们制定的章法和采取的措施，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约就只能跟着走。现在不行了，发挥作用的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G-20会议。而且重大问题总还要先同中国商量。如果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同意，发达国家涉及国际经济问题的意见也就很难行得通。

第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国际事务，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是有力的推动。头三十年，中国国力弱，国际影响小，大国间讨论和决定问题，经常是对中国置之不理，中国只能靠发表声明和开群众大会发表意见和表示抗议。现在已大为不同，正如最近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要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已离不开中国。当然中国本身的态度也

有很大变化。例如中国以前不参加联合国的维和，现在就积极参加了。其他如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处理地球温室效应，反对军备竞赛进入宇宙空间，等等，中国不但积极参与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和措施，并且以身作则，自觉遵守。

第八，中国积极参加和推动地区合作。我们认为，地区合作和走向一体化，是世界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和步骤，因此这有利于全球化发展，也合乎全球化的总趋势。在这方面，中国实行和平发展路线以后，已做了大量工作，如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发展合作，组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中非论坛，同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等，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参与方可以立即从中得益，而且宏观地和从长远看，这本身就是在为世界和平与合作，为人类发展和进步做着重要的奠基工作。

第九，中国的和平发展使中国的实力有所增强，可以对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做出一些贡献，进行一些援助。头三十年我们也进行对外援助，但那是在自己勒紧裤腰带蒙受牺牲的情况下进行的，数量自然有限，而且多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或出于领导人的好面子，效果不大也并不都好。现在的援助，不但数量较大，而且完全是为了相互合作和促进对方的经济发展。例如为应付金融危机向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中亚成员提供的百亿美元的现汇基金，三年来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优惠贷款，减免债务等，都收到很好效果，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十，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促使国力逐渐强大，中国对世界所负的责任也不断增加。头三十年，中国顶多被视为地区大国，所负责任自然有限；现在被视为世界大国，当然就要对全球事务负责。中国也确实称得上负责任的大国。不但对世界经济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如这次对待世界金融危机；而且对涉及全球和人类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持积极和负责的态度，如对这次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就自主提出得到各方称许的减排任务。其他如地球生态的保护，传染病的防治，不参加军备竞赛等等，就不用多说了。

上面列举的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的贡献，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是这些至少说明，比起前三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了。能做到这点，正是由于我们改变了对时代的误判，执行了和平发展路线的结果。世界上有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也公开声明，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和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个好的机遇，而不是威胁和挑战。

当然，中国在过去一直到现在的发展中，也和其他国家一样，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大家可以互相参考互相学习。至于说到有一个“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中国的主流舆论已经表示否认，而且在中国的经验中本来就有一条重要原则：各国的事情只能按照各国自己的情况办理，照搬照抄外国的一定失败。

也许人们会问，过去的和平发展使中国变得日益强大，那么强大以后还会不会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我看来，答复是肯定的。因为首先，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上面已经列举一些急需克服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解决起来就得很长的时间，更不用说工业化，城市化，变成文明国家，实现公民社会了。就算我们的经济总量（GDP约四万亿美元）赶上以至超过了日本，那与另外两个经济实体美国（约14.4万亿美元）和欧盟（约18万亿美元）还有极大差距，而两者的人口不过三亿和五亿左右。日本的人口更是我们的十分之一。中国要在人均这个硬指标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恐怕半个世纪的时间都办不到。其次，从世界形势和人类社会两者的发展趋势看，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长期保持下去。人的聪明智慧的快速提高，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利益交错和文化融合的全球一体化加速发展，以及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等，都制约着世界大战的发生，世界革命似乎也看不到前景，而需要人类加强合作共同对付的，却是来自自然界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主要国家也不敢冒人类毁灭的风险对别的大国发动战

争。当然，局部战争，各种冲突和暴力事件，今后还会不断发生，频率甚至还会提高，但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大约不致再有了。世界将长期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

中国早已把走和平与发展道路定为长久的基本国策。对这一点产生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²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⁵ 《人民日报》1965年10月7日。

⁶ 《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

⁷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02页。

⁸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18页。

⁹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09页。